

读天下

梅汝璈与东京审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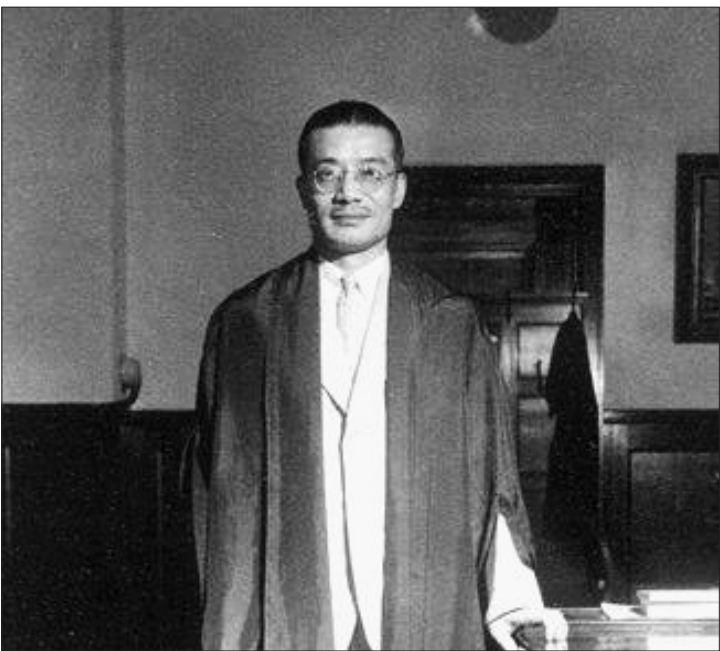
李志伟

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了,但对日本侵略者的审判却迟迟没有展开。最终在1946年3月20日,以梅汝璈等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受命飞赴日本东京,参与了対日本侵略者的审判。

经过国民政府慎重挑选,当时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是: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浚、顾问吴学义,以及担任助理的法律专家、历史学家裘劭恒、方福枢、杨寿林、刘子健等。当时,梅汝璈的身份是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

“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

梅汝璈,1904年出生于江西南昌,12岁那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清华学校。1924年梅汝璈赴美留学,1926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当年夏天又入芝加哥大学攻读法律,24岁即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指导教授称赞他有着“令人惊异的头脑”。1929年回国后,梅汝璈曾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讲授英美法学等课程。此外,他还在当时的国民政府立法院担任委员,在复旦大学以及司法部法官训练所兼职授课,这些经历为他后来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梅汝璈被



梅汝璈赴日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曾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这些日本战犯不能被判处死刑,我只能跳海以谢国人。

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时,年方42岁,当时舆论对他的评价是:精通法学理论,善于雄辩而又头脑冷静。

让梅汝璈感到高兴的是,他刚到东京不久就遇到了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的清华老校友、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顾毓琇在为梅汝璈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郑重

地向他赠送了一把宝剑。顾毓琇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梅汝璈看着寒光闪烁的剑锋,激动地说:“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依法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力争坐席次序,退出预演法庭

不久在盟军总部的支持下,由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成立。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聚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各位法官对法庭上的法官座位的排序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梅汝璈也不例外,他说:“任何国际场合,争座次在所难免,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力争得到之。”

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庭长——澳大利亚的一位老法官韦伯的设想是,让两位与他亲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

手。在预演的前一天,韦伯宣布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

5月2日,即法庭正式预演的那一天,韦伯宣布:法官坐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非,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的安排。按照这个安排,庭长右边是美、中法官,左边是英、苏法官。很明显,英美居中,排挤中国。梅汝璈当即指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欲退出预演法庭,以示抗议。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因此,韦伯只能放下身份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他盯着梅汝璈一字一句地说:“兄弟们同意的意见,预演就按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

为国旗位置,与美国法官雄辩

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法官之间又因国旗位置发生了争执。这时候,审判席后面插着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立刻向梅汝璈打了一个手势。梅汝璈马上心领神会,向庭长韦伯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美国法官克莱墨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梅汝璈当即用流利的英语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他说:“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侵略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伤痕累累,几千万亡灵沉冤九泉。17年间,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国军民伤亡逾3500万人,击毙伤俘日寇达130多万,占日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正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力。”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最终,美方理屈词穷,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国内新闻媒体闻讯后立即刊发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还及时

刊出“号外”。

力争对日寇首恶处以死刑

5月3日,对东条英机等日本战犯的审判正式开始。审判期间,以梅汝璈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凭着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报仇的高度责任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一次法官会上,梅汝璈慷慨陈词:“由法庭掌握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对此种种人类文明史罕见之暴行,我建议,在判决书中应该单独一章加以说明。”由于梅汝璈的努力,国际法庭终于将日本战犯矢口否认的南京大屠杀写进了判决书。但在最后量刑时,各国法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庭长韦伯主张将战犯流放到荒岛上,印度法官则建议应以慈悲为怀,无罪开释日本战犯。梅汝璈主张对日寇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在梅汝璈的据理力争下,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判处绞刑。

在判决书的书写问题上,梅汝璈再次以其凛然正气和爱国之心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和尊严。当时,有人主张判决书统一书写,但梅汝璈认为,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中国人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因此这一部分理应由中国人自己书写。经过他的交涉,这次历史性审判形成的长达90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判决书,留下了梅汝璈代表中国人民写下的10多万字。

对于那场历史审判,日本国内也许有不同的看法,但梅汝璈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战争和历史:“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摘自《清华百年风雨实录》,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

《我与八十年代》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激情燃烧、浪漫热忱的年代,回望和反思80年代,也是对当时世世的审视和通问。本书是马国川自2007年底开始进行,持续到2008年岁末的系列访谈结集。访谈对象为12位80年代的风云人物——王元化、汤一介、李泽厚、刘道玉、张贤亮、刘再复、温元凯等,他们中间有思想家、哲学家、法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也有新闻记者。他们的对话有对80年代的歌唱,也有批判;有追忆,也有反思;有深情眷恋,也有决然告别。通过这些访谈,作者带读者重回80年代,以梳理当代中国改革的思想源流,思考中国未来的方向。

(马国川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6月出版)

《吴简研究》

长沙走马楼吴简于1996年在湖南长沙出土,数量巨大、价值极高,曾被誉为中国20世纪100项最重大考古发现之一。据悉,通过考古人员对这批简牍的清理保护,最终确认简牍总数为14万枚。走马楼吴简出土的重要性在于这批文物将为研究三国的历史,尤其吴国的历史提供有力的依据。众所周知,有关三国历史的文献资料十分匮乏。本来在魏、蜀、吴三国中,以孙吴立国时间最长,但流传于世的史料却并不多。本书是有关吴简研究的学术论文集,包含了许多大家对吴简的研究成果。

(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等编 中华书局2011年7月出版)

《布衣:我的父亲孙犁》

本书作者是当代著名作家孙犁最小的一个孩子,成家前,她经历和感受到了家中的一切,看到了父亲的喜怒哀乐;退休后,她又经常侍奉父亲,看到了父亲的创作与交往。本书是作者对父亲和这个家的回忆文章的结集,回忆是幸福的,也是痛苦的。这本集子的灵魂,是女儿对父亲、母亲的深情。另外,作者也写出了孙犁对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以及儿女的真情。

(孙晓玲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6月出版)

《理解媒介》(增订评注本)

本书曾被誉为“20世纪为数不多的重要思想著作之一”,初版于1964年,是一部媒介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作者认为,电话、电报、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塑造了一个新的文化形态和传播方式。通过对不同媒介的比较,以及与种种文化现象的关联,作者勾画了一种电子媒介文化社会的图景,并对其发展趋向做出了某些预言。作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加拿大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批评家、传播学家,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一代宗师,被誉为20世纪的“先知”“圣人”,以“地球村”和“媒介即讯息”等论断名震全球。在互联网一词尚未出现时,他已经预言了互联网的诞生。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 著 译林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爸爸爱喜禾》

当作者蔡春猪把《给儿子的一封信》贴到博客里,几乎在一夜之间,这封信就被浏览数十万次。在儿子喜禾被确诊为“自闭症”之后,小蔡在博客中以“自强不息、爱开玩笑”的喜禾爸爸形象,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和戏剧性的细节场景,小心翼翼地绕开悲剧的漩涡,展现出笑中带泪的乐观和对生活的热爱。本书分为两部分,“英雄句短·父亲篇”收录了小蔡在得知儿子患“自闭症”后的感受,特别是他从无法接受现实到必须承担的内心理转变过程;“一个父亲的猜想·喜禾篇”以关键词的形式模拟儿子喜禾的语言看亲人、看家庭、看世界,角度独特,令人忍俊不禁的同时折射出特殊家庭的特殊关系。

(蔡春猪 著 新星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西部大开发与新疆跨越式发展》

本书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秘书长刘以雷的著作,全书16篇文章汇集了他近五六年对新疆乃至西部发展的思考。作者分析了新形势下投资新疆的策略和方式,提出了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金融体系的构想;研究了新疆跨越式发展与中国彩棉产业的未来;深入分析了西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障碍和对策;提出在新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必须处理好的六大关系等。这本书既反映了作者对西部大开发和新疆发展的深刻思考,也折射出作者对西部发展和改革的强烈责任感。

(刘以雷 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1911》以老照片的形式纪念辛亥百年

本报讯 (记者李静)发生在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加速清王朝覆灭的关键,促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建立。为纪念辛亥百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近日推出了一部以图片为主的纪念性书籍《1911》。

该书以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20年代的标志性事件为线索,以老照片的形式呈现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中国和中国人,以视觉影像的方式寻找着我们共同的记忆。

本书的编著者刘香成曾任美联社摄影记者,1992年因对苏联

解体的杰出报道,与同事一起荣膺“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与“美国海外俱乐部柯达奖”。书中所呈现的图片是刘香成通过寻访世界各地的档案馆、博物馆及私人收藏所得,有1/3以上的图片是首次发表。通过厄内斯特·莫理循、方苏雅、路得·那爱德、小川一真等来华摄影师、传教士和探险家的镜头,你会看到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沧桑。著名评论家雷颐说,自摄影术发明以来,影像就渐渐成历史书写的一部分。以图证史,图文互证,相互阐释,历史越来越丰富、真实、生动,这就是《1911》的意义。

支持实体书店

版署向超市发图书营业执照

本报讯 由于房租、人员成本上涨,加之网络书店的冲击,实体书店生存越来越难,有的不堪重负关张了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家将在政策层面对实体书店给予支持,措施之一是扩大图书销售点,参照国外经验,向连锁店、超市颁发图书营业执照。

柳斌杰表示,我国的实体书店,包括一些专业性、学术性的实体书店,要继续巩固完善,扩大覆盖面,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国家将在政策层面给予支持,主要措施包括:新闻出版总署会同中宣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出台专门文件,要求各地在

城乡建设和文化建设规划中必须保证有足够的出版物发行网点,坚持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确定的原则:书店必须建设在繁华地段。署署长柳斌杰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家将在政策层面对实体书店给予支持,措施之一是扩大图书销售点,参照国外经验,向连锁店、超市颁发图书营业执照。柳斌杰表示,我国的实体书店,包括一些专业性、学术性的实体书店,要继续巩固完善,扩大覆盖面,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国家将在政策层面给予支持,主要措施包括:新闻出版总署会同中宣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出台专门文件,要求各地在

(张玉洪)

拾音阁

“现实如山,而我浪漫如云”——评长篇小说《卡瓦》

孟繁华

“代际”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似乎是一个重要概念,如“70后”“80后”。“60后”好像还仅仅隐约出现而没有大行其道,原因是“60后”是有迷离的历史和文化记忆的一代,他们与那两个年代的人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有这个说法的话,那么这也就是一个不大靠谱的说法:似乎有历史和文化记忆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就有了某种优越感,没有就应该是一种先天缺陷。事情肯定不会是这样。无论出生于哪个年代,写出好的作品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写出他们那代人独特体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右派”那代作家有他们的代表作,“知青”一代有他们的代表作,但“60后”似乎还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卡瓦》就可以认为是这代人生活和精神传记的一部分。这是一部热情喷发、激情四溢的小说,是一部哀婉忧伤凭吊青春的挽歌,是一部发自内心直抒胸臆的抒情诗篇。

小说用第一人称叙事,使小说具有了强烈的自叙传性质。小说的主要人物孙浩然以及1968年出生的那一代人——杨步升、落雪以及高潮,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大学毕业一直到当下,经历20年岁月的磨练洗礼,本身就是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他们这代人,正赶上了一个高度物质化的时代,青春期的转

折与社会的大调整带来的价值观念的混乱,使这代人有一些茫然,他们人生的探索虽然带给了他们新的生命故事,带来了空前张扬的生命体验和实验场域,但代价如影随形。孙浩然这代青年毕竟不同于他的前辈“高加林”,高加林遭遇了“现代”受挫之后,他还有一个退路——他可以回到乡村,回到那个被认为是“根”的地方。但是,到了孙浩然的时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社会转型早已超越了思想精神和文化层面,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性”。孙浩然这个偶犍风流的校园才子,这个写出过“现实如山,而我浪漫如云”的校园诗人,曾经易地获取了校花落雪的芳心。他们终于如愿以偿结为连理。但是他们遭遇的这个时代出了问题,不仅孙浩然有了外遇背叛了爱情,就是落雪也难免不断与杨步升有了欲说还休的关系。这种关系已经预示了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后果,尽管它“那样撕心裂肺”!这代人无“根”可寻,他们迅速成了时代的流浪者。

当然,《卡瓦》不只是讲述了“那场风花雪月的事”。90年代进入社会的青年,首先面临的是“安身立命”的问题。当孙浩然和落雪一起为房子奋斗的时候,我们会感到那就是那个时代青

年夫妇的生活,虽然艰难,但也隐含着某种微茫的希望和幸福。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孙浩然、杨步升和高潮,很快犹如18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主人公,开始与各种女性周旋、敷衍,你不能说那里没有真情,但也不能说那是海誓山盟的生死恋。在90年代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使他们看上去既像浪漫的骑士又像多情的骗子。这是一个有鲜明文人气质的群体。应该说,通过1968年代人的叙述,使《卡瓦》这部小说具有了强烈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气质:这当然不只是男女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理想 and 精神的坚持。你浪漫如云,但现实如山。我们都知道,所有理想和浪漫的事物幻化为现实都是痛苦的,比如林黛玉,作为文学人物绝对可爱,但如果娶她为夫人过日子,那情形是只可想象而不能体验的;再比如贫困、寒冷、孤独等,在诗文中都浪漫无比,但在现实中都痛苦无比。《卡瓦》就是在这样一个悖论中,书写出了1968年代人在这个时代的成与败、喜与忧,以及困惑与迷茫的精神历程。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关于“60后”的书写,如此的诚恳和快意,尚未见其超越者。

(《卡瓦》已由现代出版社于2011年6月出版)

